



第556期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酸柠檬的“眼泪”

□ 邱俊霖

一日，大文豪苏东坡在街上听到有小商贩叫卖“黎檬子”。“黎檬子”是什么？就是柠檬。宋代地理学家周去非在《岭外代答》里介绍：“黎檬子，如大梅，复似小橘。味极酸。”岭南有一种叫“黎檬子”的水果，大如青梅，又有点儿像小橘子。味道极其酸。之前，我一直以为是柠檬是lemon的音译，“黎檬子”和lemon是谁率先进入人们的视野，我还无从考据。苏东坡被贬谪到海南岛，“黎檬子”也见得多了。在海南岛上，随处可见黎檬子树，每到结果时节，枝枝硕果累累，芳香沁人。柠檬特别酸，最简单的食用方式，便是将柠檬切片，泡上一杯柠檬水。《岭外代答》里，有不一样的吃法：“或云自南蕃来。番禺人多不用醋，专以此物调羹，其酸可知。又以蜜煎盐渍暴干，收食之。”古人也喜欢将柠檬制作成消暑的冷饮。元代时，广州的“御果园”里栽种了大小八百株柠檬。元代学者吴莱写过一首诗：“广州园官进渴水，天风夏熟宜檬子。百花醞作甘露浆，南国烹成赤龙髓。”苏东坡来到海南，见到柠檬，会想起故人往事：“吾故人黎鞞（音为chún，意为铜制乐器），字希声，治《春秋》有家法，欧阳文忠公喜之。然为人质木迟缓，刘贡父戏之为‘黎檬子’，以谓指其德，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。一日联骑出，闻市人有唱是果鞞之者，大笑，几落马。”

这个故事是说，苏轼还年轻时，有位忘年交叫黎鞞，对于《春秋》的研究很有造诣，欧阳修特别赏识他。黎鞞为人质朴迟缓，甚至显得有点儿木讷。于是，两人的另一位朋友刘放开玩笑，给他取了个外号——“黎檬子”。意思大概类似于今天的“榆木疙瘩”，大家以为这是在调侃他的性格，黎鞞也不放在心上。

有一天，苏轼和黎鞞、刘放一起骑马出门，忽然听见有人在呼唤“黎檬子”，黎鞞回头问道：“你叫我干吗？”可定睛一看才发现，原来是市场上有人在叫卖“黎檬子”。再仔细观察一番，原来这黎檬子指的是水果，不是黎鞞。同行几人忍不住捧腹大笑。许多年过去了，苏轼再见到黎檬子，大概会时不时感慨：那时候我们几人都没见过黎檬子，所以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。如今，我这屋前屋后都种满了黎檬子，可早已物是人非：“今吾谪海南，所居有此，霜实累累，然二君皆入鬼录。坐念故友之风味，岂复可见！”对苏轼来说，酸酸的“黎檬子”里，有一段友谊。

到了清代，诗人申靖夏，在病中听到朋友去世的消息，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悲伤地写道：“数昨，闻湖亭故人朴士亨之逝去。至今余枪在心，异时吾兄醉卧江楼上。欲复一呼朴牛，何可得也。念坡翁黎檬子之语，不觉涕下也。”申靖夏听说老朋友去世了，不由得想起了“坡翁黎檬子之语”，他不禁鼻子一酸，眼泪便止不住流了下来。苏东坡的朋友遍布天下，对于他来说，交朋友可没有什么条件或者规矩。他的朋友，既有忘年交，也有不同信仰的朋友。黎鞞和苏轼的年龄相差二十多岁，可他们照样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。君子之交淡如水。只要聚在一起自在快活的人，都是朋友。就好比苏轼和黎鞞、刘放之间，即便是取个外号，也能够相互理解甚至欣然接受，朋友之间相处就应该如此舒适吧。换言之，大家聚在一起，开心不就不是最大的收获嘛！

（摘自2024年7月19日《杭州日报》）

米茶回味长

□ 陈启银

米茶是我老家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风味小吃，但米茶连着的那些记忆，于我却有着不平常的温暖。小时候，我便听奶奶讲过米茶的传说，觉得这种小吃不仅味美，还颇有些底蕴。后来我离家去县城读高中，每到夏天的傍晚，米茶的香味便从大街小巷飘出，我会特别想家。有一天，最后一节是体育课，因为打篮球太开心，忘了时间，错过了饭堂的饭点，家在县城的班长便主动邀请我们到他家去吃饭。年少不懂客气，大家欣然前往。很明显，家中两位长辈对我们的突如其来没有任何准备，但还是异常高兴，马上忙碌起来，招待我们的是米茶和凉面，还有凉拌黄瓜、木耳和在外面买的几个卤菜。

进入夏季，很多人家都会备一些米茶来。先将大米放在锅里干炒，至大米发黄带焦时起锅，凉透后再装进坛坛罐罐备用。只见班长的母亲苏妈麻利地抓出几把米茶放在锅里，用自来水淘洗好，加清水，用旺火煮，米“开花”后立即关火。凉面是碱面做的，放进烧开的水里，煮熟，捞出，用凉水过一遍，然后将蒜末拌盐捣烂，和葱花、白芝麻、酱油、老陈醋、香油一起搅拌均匀。一口凉面，微微微酸，有麻油的香味，顿时让我如食山珍海味。一口米茶下肚，凉爽可口，微甜不淡，妙不可言，再拌点凉菜在嘴里一咀嚼，真是回味无穷。

那天我们吃得特别开心和热闹，这些家常味道让离家的孩子重温了家的温暖，现在想起来还是满满的幸福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回家干过全套的农活，累得喘不上气时，只要坐下来喝一碗母亲煮的米茶，便顿觉浑身舒坦。后来我离开家乡，奔波于广东、广西各地，回老家的时间少了，吃米茶的次数变得屈指可数，但心中依然留恋其味道。

如今，我居于广州，生活终于稳定了。广州的夏天时间长，也适合吃米茶。有个朋友“发明”了一种新煮法，米茶米煮开即关火，用密封好的锅盖盖上，焖个三五分钟就好。出锅的米茶水色淡黄，米与汤分离清晰，香味浓郁，再用井水冰镇，吃起来甘之如飴。

我现在常年都备着米茶来，要么从老家网购，要么让哥哥姐姐从老家快递来，再用玻璃罐存储。不是非得要用老家的米，而是老家的米制作的米茶吃起来特别清香、爽口，我想，这是因为回味起来有家的味道吧。

（摘自2024年8月6日《广州日报》）

宽容

□ 董川北

小时候，我发现村里有对看上去很不般配的妻子。男人是屠夫，夫妻俩每天凌晨两三点起来干活，忙到天刚蒙蒙亮时，再到小镇的露天菜市场去卖肉。

男人生得虎背熊腰，皮肤黝黑，胡子拉碴，看上去一点也不讲究，特别是到了夏天，光着膀子站在肉摊前，大声吆喝，唾沫横飞。再看他身旁的女人，负责过秤装袋，收钱找零，说话轻声细语，斯斯文文。她喜欢在围裙的胸口处别上两朵栀子花。等到菜市场人流渐稀，女人还会从案板下掏出一本书，虽然多半是言情小说，但她看书的姿态显得很优雅。

这对外貌、性格都有很大差异的夫妻，结婚多年一直相敬如宾，和和睦睦。听他们的邻居说，十几年来都不曾见二人红过脸。最后大家一致得出结论：找对象就要找互补型，比如男人是急性子，那就要找慢性子的人。成年后的我，倒觉得这个理由太过牵强，夫妻间幸不幸，最关键的一点，是宽容。夫妻间不要试图改变对方，而要努力适应对方，彼此心甘情愿地谦让对方，包容对方的缺点，如此岂有不幸的道理？

（摘自2024年7月16日《今晚报》）



过去的教授（一）

□ 谢泳

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人，可能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：本世纪（二十世纪）初，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，大多是一批传统的士子，比如北大校长蔡元培、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、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、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，以及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，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。如果仅仅是个别人，也许还是特例，但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，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。

不仅如此，这些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者，同时又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，比如蔡元培，是留德学生，而蒋梦麟是留美学生。而且，从一开始，他们就居于教育的主导地位，像蔡元培、蒋梦麟都是做过大学校长和“教育部长”的人。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，最需有好的设计者，这一点，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。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，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，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。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，可以说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。有了这样品格的人，才奠定了好的大学制度，最终才出现了像北大、清华、复旦等一些向当时国际一流大学看齐的大学。

对今天的人来说，那个年代已成历史。我们只能回望，从前辈学人留下的点滴文字中，感受那个年代的大学，以及那个年代的教授。

自由流动的教授

过去的教授是可以自由流动的。所谓自由流动，是指大学校长有聘任教授的自主性，而教授也有自己选择大学的自由。自由流动其实就是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的具体化。由于过去的教授社会地位较高，经济上相对也有保障，这使自由流动成为教授生活的一种常态，就是说，过去的教授一般不会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学里混下去，特别是年轻教授，他们的流动性是很大的。

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机制，教授在选大学，大学也在选教授，教授最终固定下来的大学，通常就是他们比较满意的大学。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，对于展示一个人的才华有积极意义，同时也对教授保持学术活力有促进作用。

1932年，杨树达在清华执教，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是刘文典，因为有人说了杨树达的闲话，他就决定离开清华。杨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件事：“十一日。书与系主任刘叔雅（文典），告以下年不愿受清华之聘。廿二日。文学院院长冯芝生（友兰）来，言见余与叔雅书，有辞职之说，务请打消此意云云。余答言：‘闻学校有人与余为难，故有彼信，余使学校为难。余学问佳否，姑可不论，即凭余之努力，学校不应因诸先生无知之言而对余不满。’芝生唯唯而去。廿三日。在清华，刘叔雅来信：学校局面已定，不许余辞职，休假不成问题。此次当教授皆续聘三年，希望假满后仍回学校任教云云。”

像这样的情况在过去的大学里是常见的，是真教授就不愁没有去处。当年鲁迅在中山大学，后因傅斯年又聘了顾颉刚来中大，而鲁迅和顾颉刚有积怨，不愿待在一个学校，所以很快就离开了。由于有自由流动的机制，大学里教授之间的矛盾一般能够减少到较低程度。

说痛快话的教授

张东荪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，早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。当时学校有一个惯例，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，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囑。张东荪对此很反感，有一次忍不住说：“下次再读遗囑，我就不来了。”遂夺门而去。

西南联大时，国民党当局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，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罢脱口说道：“扯淡，我就不入。”过去的大学里，教授对于党派活动一般是比较反感的，这种态度源自西方的大学理念，还不仅是对某一具体党派好坏的评价，而是从根本上反对在大学里进行党派活动，无论是什么样的党派活动，教授们都不赞成。王瑶在《念朱自清先生》一文中说：“他平日并不过问政治，1942年昆明学生发生倒孔运动后，国民党大批拉拢大学教授入党，在1943年5月9日的日记中，曾记载闻一多先生和他商量一同加入国民党，因了他的拒绝，才没有加入。”

张奚若是中国知名的政治学教授，抗战期间，曾做过“国民参政会”的参政员。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。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，打断了张奚若的话。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，返回昆明。下次参政会开会时，张奚若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，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：“无政可参，路费退回。”1946年初，在旧政协开会前夕，张奚若应西南联大学生会的邀请，做过一次演讲，开讲之前，他就说：“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，我一定对他谈，请他下野。这是客气话。说得不够客气，便是请他滚蛋。”

（待续）

（原刊：《教育》2008年第6期）

鼠李花给睡莲的信

□ 鲍尔吉·原野

亲爱的睡莲：我最近做了很多梦，我觉得不把这些梦告诉你就浪费了。我做过的梦多到说不过来，我挑几个有意思的梦告诉你吧。

第一个梦。我梦见我变成一只梅花鹿跑到湖边看自己的倒影。鹿身上的皮毛黄棕色，淡白色的花瓣变成了蓝色，因为我是鼠李花。你还记得吗？我的花是蓝色的。这样也很好。我奔跑，在长着毛榛灌木和杜香灌木的树林里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。你是不是认为我“嗖”字用得太多了？我本想从开头到结尾全写“嗖”字，这多酷！但怕你不高兴就只写了十三个“嗖”。跑的时候我丝毫不碰到树枝和树叶，连地上的青草都没踩到。你知道我是一株植物，每天站在那里，最喜欢奔跑，今天总算在梦里跑了起来。我奔跑非常轻松，一点不觉得累。一口气跑到高高的博格达山顶峰。从山上往下瞭望，山坡上落满了野鸽子，他们笨拙地走动，呼地飞起来又落下，像一片灰色的云彩。这是说南坡，我把目光转向北坡。乌力吉木伦河从山下流过来，像洪水那样。河里的鱼在水里蹦高，落在了蔓越橘灌木的枝叶上。这些鱼在树叶上翻滚，身上的银鳞闪闪发光。我跑下山，听到头顶叮叮当当响，接下来，响声消失了。我一直往前跑，头顶又叮叮咚咚响起来。我跑到河边看自己的倒影。原来我头上的角挂满了银铃铛，不知道是谁给我挂的。我带着这些铃铛绕着博格达山跑，总算过了奔跑的瘾。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……

第二个梦。我梦见自己变成了鱼。河里有许多鱼，有麦穗鱼、鲢鱼、鲮鱼和泥鳅鱼，他们往东游，我往西游。这些鱼问，你疯了，为什么往西游？我说我要看看乌力吉木伦河的源头怎么样。我游着游着就到达了源头。乌力吉木伦河虽然很宽阔，但源头是很小的溪流，水很浅。我上了岸，变成了一只田鼠往前跑。前面是一座大山，这座山没有博格达山那么大，山上全是石头。七个地方的泉眼流出的水汇集到一起，变成了乌力吉木伦河。他的源头原来是这样的，我要告诉万度苏草原的动物们，我去过乌力吉木伦河的源头，他的水由七个泉眼组成。我正准备上山去喝泉眼冒出的水，脚下的石块坍塌，呼地醒了。这个梦就做到了这里。

第三个梦。我梦见一只狼把我咬断，叼进狼窝里。狼残忍，叼我的时候，刮到毛榛枝条的刺。他进到狼窝里，把我的花一小簇一小簇摘下来，分给其他狼。这些狼好像在开会，他们把我的花戴在耳边，咧着大嘴笑，露出大粉舌头，特恶心。我气炸了肺。虽然我是微不足道的小花，但不能忍受这样的屈辱。美丽的鼠李花怎么能戴在你们狼的头上呢？我大吼，不！结果我变成了豹子，那些插在狼耳边的花全变成了豹子，从狼耳上跳下来，与狼对视。狼有些害怕，领头那只狼说，这些豹子不好惹，咱们跑吧。狼跑出了狼窝，窝里只剩下我们。我们互相打量，狼窝里全是豹子，瞪着圆圆的眼睛，棕黄色的皮毛上带着醒目的黑斑。我们特别自豪，一个劲儿龇牙笑。我们的牙比雪山还白。我说从今往后，我们就是豹子了，不再当鼠李花。这时候醒了。回味我的梦境，感觉到非常遗憾。这是我做过的三个梦，你羡慕吗？如果你也有好梦就写信告诉我。

爱你的鼠李花
（待续）

（摘自《当代》2024年4期）

□ 图片来自网络

